

祖国丛书



祖国丛书

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

何玉林 刘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祖国丛书

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

何玉林 刘 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同宝
封面装帧 范一辛

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

何玉林 刘 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颀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45,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11074·639 定价 1.05元

目 录

- 写在前面.....(1)
-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3)
- 我爱中国
- 记埃德加·斯诺.....(23)
- 大地的女儿
- 记艾格妮丝·史沫特莱.....(47)
- 登临“月亮背面”的女性
- 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65)
- 洒满阳光的道路
- 记马海德.....(77)
- 两次加入中国籍的魏璐诗.....(96)
- 白求恩,无产者的骄傲.....(106)
- 人民军队的臂助
- 记柯棣华.....(125)

中国之恋	
——记傅莱(141)
他从欧洲来	
——记米勒(153)
我的家就在中国	
——记爱泼斯坦(162)
女摄影家叶华(185)
纯朴的心	
——记李莎(200)
从美国律师到中国文学翻译家	
——记沙博理(214)
一个美国妇女在中国	
——记陈必第(231)

写在前面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记述了部分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崎岖、曲折的道路上，所经历的风雨和跋涉的足迹。

旧中国，是一个饱经内忧外患、深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那时候，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是为了淘金，为了掠夺这片国土上的财富，他们往往支撑摇摇欲坠的、垂死腐朽的政权和制度。而本书介绍的国际友人，却与之截然相反。他们同情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的还冲破各种阻力和障碍，直接加入到中国人民的革命行列中来，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开战。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起，就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同甘苦、共患难，成为中国革命的老战士、老同志和老朋友。他们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为真理而英勇献身的精神；那种热爱中国，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的崇高国际主义情感；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美好心灵，以及坦诚纯真、坚韧不拔的品质，都感人至深，

令人崇敬，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既然这些外国朋友能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贡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能把自己的热血乃至生命抛洒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么，作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我们对自己的祖国应当怀有怎样的感情、应当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作出怎样的贡献呢？……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尽力的国际友人是很多的，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只按自己掌握的材料，记述了十五位国际友人在华工作的历程和事迹。其中包括一部分现在已经加入了中国籍的，正如邓颖超同志在六届政协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称呼的“中国籍的原国际友人”。本书未能介绍更多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弥补这一缺憾。

我们在采访与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路易·艾黎同志和马海德、爱泼斯坦等在京的外国血统全国政协委员及其亲属的热情接待和关怀，定稿时还承他们过目审定；我们还得到了全国政协、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卫生部、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帮助。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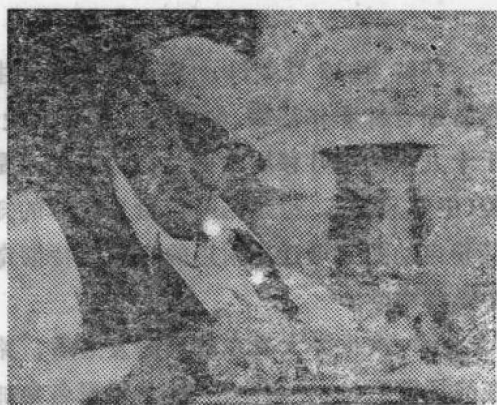
何玉林 刘群
一九八四年七月
于北京东便门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

在北京台基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庭院里，人们可以经常看到一位新西兰老人粗壮结实的身影。他有时在幽静、宽敞的书房内凝神写作；有时从这里出发到各地参观旅行，有时在这里的客厅接待前来造访的各国朋友……

1977年12月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为庆贺这位老人八十寿辰举行了一次热烈、隆重的晚宴。在宴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代表我国的党、政府和人民祝愿老人健康长寿，同时发表了下述热情洋溢的讲话：

“今天晚上我们欢聚一堂，为一个老战士、老同志、老朋友的八十高寿表示



路易·艾黎近影

祝贺，他的名字就是路易·艾黎。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但是，象艾黎同志这样五十年如一日，不管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我们创业的时期，或者在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的日子里，始终如一地、一贯地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大量努力，这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我们感到，他的工作非常值得我们感谢。”

路易·艾黎，这位著名的新西兰诗人和作家，这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和平卫士，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在中国的经历是独特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他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令人感动的。他在中国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而又光辉的人生道路。

1897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里省斯普林菲尔德市。他的祖父原是南爱尔兰的无地农民，于十九世纪中叶移居新西兰；他的父亲是当地一所主日学校(中学)校长，母亲是一位贤良敦厚的知识妇女。路易·艾黎自幼随父母迁往附近的克赖斯特彻奇市，在那里上了小学和中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后，路易·艾黎的哥哥在战场阵亡，这导致他在1916年报名参加了新西兰国防义勇军，并赴欧参战，两次负伤。1919年，路易·艾黎退役后

回到新西兰，一度与人合作经营默沃特阿农场，但在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农场办得很不景气。1926年，路易·艾黎去澳大利亚做工，当海员。这时报纸上不断刊登中国北伐战争的消息，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引起了路易·艾黎的注意和好奇。他决定到中国去，看看这个动荡的东方大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到夜校补习了一些简易的无线电和电工知识，就在1927年3月13日乘坐一艘载运中国劳工回国的轮船，经菲律宾抵达香港。路易·艾黎在香港逗留三天，听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4月17日，他换乘另一艘轮船，经过四天的航行，于4月21日到达了目的地——上海。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路易·艾黎初到此地，很快就发现租界里有许多铤而走险的外国冒险家，从事贩卖鸦片、枪枝以及“把铜币用船运到广州去，赢利三成卖出”等走私活动，看到这些家伙如何利用土地出租、放高利贷等卑劣手段，大发横财。路易·艾黎作为一名正直的新西兰青年，对不可一世的冒险家们不屑一顾，对他们的贪婪、残忍、傲慢的行为和举止，极为厌恶。

路易·艾黎带着介绍信，求见一家酒店经理。企望获得职业。在这个经理的推荐下，路易·艾黎于1927年5月16日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处，担任一名负责检查工厂防火措施的见习官员，几个月后任该处督察员。这是一个可以只拿钱不干事的闲职。路易·艾黎不甘心无所事事，就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汉语，而且学得十分认真。周围的

同事对这个温和憨厚的新西兰青年，如此不遗余力地攻读令人头痛的中文，感到惊讶与可笑。路易·艾黎还到处奔波，一丝不苟地检查各工厂企业的防火安全措施。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在1932年被任命为工业科督察长。

路易·艾黎到上海的第四天，就在给家人的信中谈到这个城市贫富不均的现象：一面是住着古代宫殿式宅邸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一面是“辛苦劳动，比牛马还不如”的“处于最底层的阶级”！他到消防处任职之后，由于经常深入工厂，对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苦难，认识得更具体、更深刻了。缫丝厂童工每天十二小时站在热水桶前艰辛忙碌，橡胶厂四百名工人在爆炸中丧生，纺织厂包身工在发生火灾夺门而出时受挤压身亡……一桩桩血淋淋的事实，激起了路易·艾黎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罪恶制度的愤懑。有一次，他陪同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参观一家血汗工厂，当谈到如何才能改变这个残酷的现实时，他确信“唯一的出路是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史沫特莱听了非常兴奋，她握住路易·艾黎的手，说：“那末就让我们想办法变革它吧！”

路易·艾黎对中国劳苦大众怀有深切的同情。在上海，他经常把面黄肌瘦和患病的童工带到他的朋友普拉特医生那里免费治疗；对那些不顾工人死活、没有防火设施的工厂，毫不留情地以督察身份勒令其停工，直至安装了防火安全设施。尤其是在中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路易·艾黎对救灾活动表现了高度的献身热情。1929年春夏，中国

北方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土地龟裂，稼禾枯黄，饿殍遍野。这年6月，路易·艾黎利用暑期，参加了华洋义赈会在绥远灾区萨拉齐修建民生渠的工作。他为工地建帐篷，架电话线，组织灾民筑路，让他们每天领取三、四斤小米养家糊口。从黄河至黑河的五十公里引水渠——民生渠修建成功了，路易·艾黎后来说：“我在那个地区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认识了中国农民的力量。”当路易·艾黎离开萨拉齐的时候，他从当地孤儿院领养了一名十四岁的中国难童——阿兰（即段士谋同志）。1931年夏，长江洪峰冲决了武汉地区的堤防，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水灾，三十万流离失所的灾民涌进武汉市区。1932年初，路易·艾黎推迟了携带阿兰回新西兰探亲的计划，利用假期到全国水灾救济总署帮助工作。他到灾区检查堤防的加固、修复工作，想方设法把救济粮运到灾民手中，甚至绕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把粮食运到洪湖苏区；他还为灾民准备了帐篷和食物，租定了船只，有条不紊地将涌进武汉的三十万灾民，疏散到新的居住地。路易·艾黎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同事们的高度赞扬和尊敬，以至他们联名要求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允许路易·艾黎在水灾救济总署多工作一段时间。路易·艾黎在水灾救济总署工作了两个多月，离开武汉三镇的时候，又花了六百元，从汉阳孤儿院中领养了一名十一岁的中国难童——迈克（即黎雪同志）。这是一个父亲在反抗地主的暴动中牺牲，母亲亡故，兄弟失散的农民儿子，曾当过红军的小交通员。

1933年，路易·艾黎在上海同美国友人史沫特莱、马

海德等参加了第一个外国人组织的马列主义小组。据马海德回忆，艾黎和希伯是这个小组最活跃的人物。路易·艾黎在这里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联系他在血汗工厂的所见所闻来加深对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解。正如他说的：“每天在工厂里工作所发现的矛盾，使得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变得更加实际。”路易·艾黎通过史沫特莱，同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他的住所一度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党的一些负责干部和地下工作人员曾在这里隐蔽；他家楼上还架设过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路易·艾黎有时亲自掩护地下工作人员活动，用他的汽车去散发地下党的宣传品；他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组织，为苏区伤病员购买药品，为红军根据地购买无线电器材，输送专业人员。1936年10月，路易·艾黎应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邀请去太原。他装扮成一家烟草公司的外国经理，分别前往三家钱庄将红军缴获的一万元山西地方币，兑换成全国流通的中央银行的钞票。这笔钱后来成为我党在西安事变期间使用的活动经费。

此外，路易·艾黎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带领来华的外国人参观工厂，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把红军的文件翻译成英文，让国外的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为美国人在上海办的进步刊物《中国呼声》撰文，协助史沫特莱完成她的《中国人的命运》、《苏维埃中国》等重要著作。而史沫特莱与红军代表秘密会见时，他又担任

翻译……

路易·艾黎在上海居住了十一年（1927—1938年），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扩大红军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革命实践活动，使他逐步转变为一名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路易·艾黎正在欧、美各国考察工业安全措施。10月中旬，他回到上海之后，耳闻目睹日本法西斯的许多暴行。他那时写给新西兰亲人的信中，经常有这样的话：

“在一家孤儿院里，昨天有六十个婴孩被‘亲善的’军队杀害。”

“一批批从日本新开来的军队，获准随心所欲地到处进行抢掠；……在被日本军队占领的街道上，有些没有被烧的房子，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抢掠来的东西。”

“一个日本人驱赶着六个年青妇女走路，显然是把她们押回军营去……”

面对着法西斯的残暴行径，路易·艾黎深深感到，如果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民不能获得和平与幸福，那末新西兰和诸如故园韦斯科特那样的绿洲，就不是安定的绿洲了。他决定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服务。他给母亲的信中说：“新西兰是一个可爱的国家，但它却不适合我在其中生活。我同

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

路易·艾黎回上海不久，即将两名养子送往延安。后来阿兰被派往新疆工作；迈克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工业合作社的工作。1938年春，路易·艾黎同美国进步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和尼姆·韦尔斯(斯诺前夫人)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旨在中国内地建立和发展工业，以支持抗日战争；同时在大后方为难民提供就业和生活必需品，制止国民党官员的走私、贩卖活动。这年年中，中国工业合作社正式成立，由宋庆龄担任“工合”促进委员会的名誉主席，路易·艾黎担任有许多国内外名流参加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秘书。尼姆·韦尔斯后来说，路易·艾黎是“委员会的中坚人物”，“大家都尊重他作出的全面判断，大家都认为他是最熟悉中国工业情况的人……。当他认为事情可行时，大家都照他的主意办。”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做出支持“工合”的姿态，任命路易·艾黎为国民党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专家。

“工合”运动开展之后，路易·艾黎同斯诺夫妇慷慨解囊，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同时到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演说，向海内外人士募集资金。为了组织和发展各地的“工合”，路易·艾黎经常奔走于我国的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地区的城镇乡村。他搭乘汽车、救护车，或骑马、骑自行车，更多的是依靠步行，在最初的两年中，行程达一万八千公里左右。他亲自在各地组织了许多

工业合作社，其中包括在新四军根据地和江西老革命根据地。路易·艾黎还根据党组织的要求，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年5月，路易·艾黎在江西赣州组织“工合”时，患了伤寒和虐疾。他在重病中三次转移，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大病初愈，又赶到川北松潘藏族地区为“工合”寻找制军毯的羊毛。一位欧洲医生曾到赣州为路易·艾黎治病，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后来逢人便赞不绝口：“崇高，崇高，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崇高的人！”路易·艾黎得知后，却说：“什么崇高，我只是干一个人应当干的工作罢了！”

1939—1941年，路易·艾黎为“工合”工作三次去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路易·艾黎的工作表示赞赏与支持，并同叶挺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工合”运动对我国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

“工合”运动在创办之初发展很快，据“工合”国际委员会1942年7月统计，“工合”在各地共设立了七十二个事务所，建立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近三千个、社员三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达二千五百万元，生产民用消费品数千种，还可生产部分军需品。路易·艾黎积极支援中国共产党抗战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和诽谤。他们指责路易·艾黎与共产党有联系，诬蔑他是“英国间谍”、“日本间谍”、“俄国间谍”、“第三国际的间谍”、“宗教冒险家”，是一个“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把许多财富存在印度银行里的匪徒”……。与此同时，有些国民党分子混进重庆“工合”总办

事处，整天耍手腕争权谋私；许多进步分子不屑与这些贪婪而有野心的人为伍，开始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路易·艾黎于1942年春发电报到重庆，要求辞去技术专家的职务。国民党当局起初并未批准，后来，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发现路易·艾黎曾为八路军制造枪枝，才于9月21日电告路易·艾黎：“行政院决定解除你‘工合’技术专家的职务”。

路易·艾黎被国民党“解除”技术专家的职务后，依然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成员，继续为巩固和发展“工合”而努力。国民党当局阴谋通过英国驻华使馆，安排路易·艾黎到缅甸去工作，有人则邀请他去美国、印度和阿比西尼亚（现埃塞俄比亚）等地访问，但都被路易·艾黎所拒绝。他热爱中国，愿意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服务，他坚信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他认为，自己可以在技术训练和技术教育方面，为“工合”作出贡献，然而他已不再试图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发展“工合”，而是寄希望于未来光明的新中国，所以特别注重发展同农村密切结合的工业，注重训练那些能够献身于新中国建设的年轻人。路易·艾黎的这个坚定信念集中表现在他对创办、建设和保护“培黎工艺学校”所倾注的热诚和耗费的心血。

三

群山环抱的双石铺，地处陕西宝鸡西南六十公里的公路交叉点上。路易·艾黎早在1941年就看中这块“风水宝